

张芝联 著

我的学术道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K091/4

2007

我的学术道路

张芝联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学术道路 / 张芝联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7. 11

ISBN 978 - 7 - 108 - 02801 - 3

I. 我… II. 张… III.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7127 号

责任编辑 刘雪枫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我的学术道路（代序）

我出生于1918年11月7日，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11日）仅四天，恰好又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仿佛预示我是为和平进步事业而生的。

我原籍浙江鄞县（宁波），生于湖北汉口，当时父亲（张寿镛，字咏霓，号约园）刚从湖北财政厅退下来，不久奉调到北京财政部任职，举家北迁，定居西安门。1922年，父亲调任浙江财政厅长，1924年因江浙军阀混战而辞职。第二年1925年5月调任沪海道尹，全家又迁居上海。接着就发生“五卅”惨案。父亲一边与各方折冲，力争释放被捕工人学生，一边应被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开除的爱国师生五百余人之请，与上海社会贤达商议，共同创办私立光华大学，并被推为第一任校长直到1945年去世。^{〔1〕}

我自幼在家塾读书，从未进过幼儿园、小学、初中，在家延请老师讲授四书、左传、诗经、尚书、古文、唐诗、宋词，虽然囫圇吞枣，死记硬背，但长大后也能领会一二，至今仍能记诵。另请教师补习英语、数学，准备中学入学考试。13岁那年我直接进入光

〔1〕 参阅《约园著作》，张芝联编，中华书局1995年。

华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当时正值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语文老师出时事题，我因史地常识贫乏，作文几乎不及格。幸而得到同级同学姚克广（依林）、谢云晖、沈叔勤、朱启奎等帮助，学习逐渐有所长进。

我的第一篇文章《世界经济会议》（1933）和第二篇《从墨索里尼到希特勒》（1934）都刊登在《光华附中半月刊》上。文章写得不很像样，学校为鼓励学生写作积极性予以发表。回想起来，原来我对世界历史和国际问题的兴趣植基于此。

1934 年夏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医预科，准备将来当医生。这是由于一次偶然事件的激动而随意作出的选择：1934 年 2 月，我二哥的岳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赴浙江长兴考察石油，在武康县因车祸头部受伤，昏迷不醒达数周。我决心中学毕业后去学医，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数理化基础较差，不能胜任，加上病疟，一年后不得不放弃医预科而转学文科。1935 年夏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从头学起。

两年的燕大学习生活，对我在政治上学术上产生了启蒙作用。1935 年“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抗日运动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运动前后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初步接触到了艾思奇《大众哲学》一类的马列主义书籍。从二年级开始，在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洋历史的同时，我逐渐被中国学术思想史所吸引，从先秦诸子到康梁及近人胡适、顾颉刚、钱穆等人的著作中吸取文化养料。燕京大学的学术空气和自由环境有利于相互切磋，探索真理，使我得益匪浅。

1937 年的“七·七”事变截断了这种“象牙之塔”的学习生活。因南北铁道中断，我无法自沪回燕大，只能作为“流亡学生”，

冒日机轰炸的危险，由上海经南京到武昌武汉大学借读。一个学期尚未结束，武大被迫内迁。我没有勇气随往，听说上海各大学已复课，乃经广州、香港返沪，转入母校光华大学，继续学习西洋文学与中国历史。

在光华两年，我有幸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一位是英国文学教授张歆海先生，一位是中国历史教授吕思勉（诚之）先生，一位是中国古代史专家童书业（丕绳）先生。在当时自由选课制度下，我选读了这三位老师开的几乎全部课程。

我在英语和英国文学方面的修养主要得力于歆海先生的教导；除此之外，他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兴趣和研究也给予我深刻的影响。^{〔1〕}我从吕先生那里学到的不只是某一段中国历史的具体知识，而是他的治学方法和观点。他上课不带讲稿，往往先在黑板上写几段史料，然后加以解释、分析、归纳，最后得出结论。他的视野广阔，重视各方面的历史现象——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思想……可称全方位史。我最记得他的《史通》专题课，一学期讲完了中国第一部史学史，有述有评，十分精彩（见《史通评》）。后来他又开过《文史通义》专题课，可惜我已离校，但仍有幸读到他的讲义。我对中国史学的粗浅知识主要得自诚师。

童书业先生开设的中国沿革地理课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这是由于在燕大时读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自序而产生的。我十分佩服童师的博闻强记能力，他能一口气背出几十条材料，一一写在黑板上，然后加以论证和发挥。我把每堂课的笔记都整理出

〔1〕 参阅郭蕊：《天涯赤子情》，《人物》1986年第3期。

来送给童师审阅,他略加修改补充后交付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沿革地理》。^{〔1〕}

我于1940年初毕业,学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史学——从〈尚书〉到〈史记〉》,是用英文写的,因为我主修西洋文学,副修历史。在写作过程中,我初步接触到了西方特别是法国汉学家的著作,如沙畹(Chavannes)译的《史记》,马伯乐(Maspero)的《古代中国》,葛兰言(Granet)的《中国文化》、《舞蹈与传说》以及费子智(Fitzgerald)的《中国文化简史》等,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在大学四年级时(1939),我和光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文哲》杂志,目的是活跃学校的学术空气,交流学习心得。我曾在这份杂志上发表几篇论文:《什么是古典主义?》,《历史理论引论》,《古代的中西交通》,《柏拉图的共和国》等,虽然很不成熟,也反映了我当时兴趣所在。

大学毕业后,我在母校附中教英语,历时一年半。这里要交代一个插曲:在我毕业前夕,父亲要我谈谈将来志向。我说:“我很想当一个中学校长,大学教授。”我当时颇受英国公立学校(实际是私立中学)的影响,认为只有中学水平高才能保证大学生的质量。我父亲提醒我,“那你的月薪恐怕只有二百元。”我答道,“没有关系,这是我的心愿。”父亲莞尔而笑,表示认可。后来我果然当了附中校长兼大学教授。确实,直到80年代中,我的月薪仍为207元,但已算是高薪阶层了。

1940年夏,我应林语堂之兄林憾庐之邀,编辑一本翻译杂志——

〔1〕 开明书店1946年版。

《西洋文学》，内容是西方文学名著和文论书评，我约请当时还留在孤岛的巴金、郑振铎、李健吾、赵家璧、叶公超为编辑顾问。我尽力向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名译者潘家洵、孙毓棠、卞之琳、姚可昆（冯至夫人）等和北平的新秀宋悌芬（淇）、吴兴华、南星、黄宗江等征稿，因而大大提高了译文的水平，丰富了刊物的内容。我在1940年7月和燕大同学郭心暉（蕊）结婚，她当时在上海工部局女中教国文。我们新婚燕尔，立即投入《西洋文学》的编辑、审稿、翻译、校对、征稿的繁重工作。到1941年夏止，《西洋文学》共出了十期，终于因物价昂贵、资金告罄而停刊，我们也于8月离开上海。

1941年秋我重新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一方面我觉得自己需要充实，仍想当学生；另一方面，当时作为美国教会学校的燕大在沦陷的北平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这是我所热心向往的。我的朋友宋悌芬、吴兴华等在燕大主编《燕京文学》杂志，我在上面发表了两篇短文：《传记文学》和《历史与文学》。我不认为史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科学，它既有科学成分，也有文学与哲学成分。

回到燕大，当时哈佛燕京学社主持人洪业（煨莲）教授找我谈话（我当时享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每年五百元）。他向我摆出历史系研究院导师的阵容——容庚（希白）、邓之诚（文如）、张尔田（孟劬）、王克思（Philippe de Vargas，瑞士人）；他逐个介绍并评论他的四位高足：齐思和、聂崇岐、翁独健、侯仁之的专长和特点。最后他根据我的家庭背景和学术兴趣及特长，建议我以明末清初历史作为专攻范围，理由是：第一，浙东文人学士这个时期在政治、学术上作出过辉煌的贡献，而我恰好是鄞县人，我

父亲编刊的《四明丛书》收集了这方面的大量史料,我应继承这份宝贵的学术遗产。我还记得他大声朗诵全谢山的诗句:

野人家住鄞江上,但见山清而水寒,
一行作吏少佳趣,十年读书多古欢。

他向我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明末清初是中国和西方文明初次接触的时期,这段历史西方学者虽作过不少研究,但他们没有掌握中国资料;中国学者也有志于此,但缺乏西方语文的训练,无法利用外国材料。因此,洪师认为我具备这方面研究的初步条件。第三,明清史专家邓文如教授和瑞士教授王克思有能力来指导我的研究。我答应考虑这个合情合理的诱人建议。

在此期间我拜访了研究院导师张尔田先生,人们尊称他为“孟老”。一位羸弱矮小的老人,蓄着短须,十分近视,说话带有浙江口音,经常咳嗽,但仍不断吸烟。谈得高兴时手舞足蹈,目光炯炯有神。我作了自我介绍,他说认识我父亲,大约在光绪三十年间两人先后在苏州候补知府。民国20年代后期,他与胞弟张东荪先生一度在光华大学执教。孟老是清末遗老,与王国维(静安)、孙德谦(益庵)共称“三友”,或称“三才子”。我逐渐发现,孟老在义理、辞章、考据、佛学等方面都有传世之作,他集浙东浙西学术于一身,而尤尊章学诚(实斋)《文史通义》。我暗自庆幸能拜孟老为师,他对我也格外诱掖,爱护备至。孟老七十华诞,父亲赠他七律两首,末两句曰:“洛社寻常何足道,最难争献见黄篇”,把孟老比作今之梨洲。从这时起直到1944年底我离京返沪这三年多时间里,我不间断地去向孟老请教,并把他的答问写成摘记。可惜这两本

问答录在“文革”中遗失了。

我的学运不佳,开学不到三个月,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燕京大学,大肆搜捕进步师生。孟老因受惊发病,不得不从西郊迁居西城,东荪先生夫人要求我与孟老同住,照顾老人,直至翌年端午节前东荪先生出狱,我才移居东城宽街,但每周仍往探视聆教。

1942年5月我应聘任中法汉学研究所助理。中法汉学研究所是用中法庚子赔款创办起来的,名义上由中法合办,实权则操在法国人手中。研究所所长是法国汉学家铎尔孟(d'Hormon),曾任袁世凯顾问,后在中法大学教书。由中国和法国学者联合组成研究组,研究重点为中国民俗学、中国语言学;后来又吸收前燕大引得编纂处的部分人员继续编印中国古籍的索引,改名为“通检”。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译汉学论文摘要和展览会目录,工作并不繁重,有充分时间读书钻研。我认真点读了中国史学经典,旁及《困学记闻》(孟老有批校)、《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史微》等。

在孟老和聂崇歧先生指导下,我写了《〈资治通鉴〉纂修始末》一文(刊载在《汉学》创刊号,1944年)。这是我第一篇略有创见的论文,材料翔实,言之成理,结论基本正确,直到60年代翦老重写此题时仍需参考此文。看来我的学术方向似乎要朝中国史学史发展,因为我准备在考订《通鉴》各段分修人之后,进一步探讨司马温公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

与此同时,我尽量利用中法大学图书馆浏览西方史学名著,在与法国汉学家接触中,努力了解他们所用的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的方法。我结识了一位颇有学术修养和艺术志趣的余敦华(Geoffroy Dechaume),我们朝夕相处,如琢如磨,探索中西文化的

异同,赞赏古都的文物建筑。他在一本著作中记载了我们的友谊,这本名为《中国面向世界》(1967)的书在他逝世后十年译成汉文出版(三联书店,1987),书中首次发表了我们的16封信件。为了盖上一层保护色,他称我为“唐林”。

1942年端午节前后,燕大师友陆续出狱,我的住处虽然离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只有咫尺之遥,几个好友仍经常来访,畅谈国家前途与战后建设计划,这是当时最大的乐趣。我念念不忘创办一所第一流的私立中学,许多师友都支持我。还记得1944年初冬,我同侯仁之冒着严寒前往香山慈幼院,考察设想中的中学基地,往返百余里,沿途抒发各自的抱负,海阔天空,不知夜幕之降临。

正在此时,我接到父亲在上海病危的消息。家中男儿都在西南,父亲曾写诗述怀,头两句曰:“生子为人用,生子亦何为?”诗没有写完,一个姐姐偷偷地寄给我。我见诗决定立即返沪,但又不忍与孟老告别,依依不舍者久之。1944年底我与妻子返上海,1945年旧历正月初七日孟老病逝,我闻噩耗恸哭数日,不能自己。唯一能做的是筹资刊印孟老的遗著《遯龕文集》,以表弟子悼念之仪。这部书终于在1948年印出。

从1945年1月至父亲病故,我专心抄录父亲自编的善本书目,整理他的诗文。7月8日是父亲七十大寿,《约园杂著三编》如期印出,使父亲十分兴奋欣慰。光华师生校友前来祝寿,父亲在病榻上以“复兴中华,复兴光华”两句话来勉励他们。此后一周进入昏迷状态,清醒时要我坐在床边为他朗读《归去来兮辞》。7月15日,他终于未及见到日寇投降而歿。父亲一生做了四件事:做官、办学、著述、编刊《四明丛书》。第一件事是他不愿提及的,他引以自豪的是创办光华大学与编刻《四明丛书》。他的遗言更

坚定了我的办学志向。

从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到1946年8月这一年中，我全力为恢复光华大学和附中而奔走，特别是在争取校舍和解决经费两件大事上。光华校舍在1937年秋全部焚于日军炮火，十余年心血毁于一旦。父亲悲痛之余并不气馁，1938年端午节前毅然经香港，飞重庆，在成都与四川同仁共同创办光华大学分校。光华上海本部先迁入租界继续上课，日寇占领租界后，为避免为敌伪利用，光华改名，化整为零，以使弦歌不绝。光复后，光华恢复原名，但校舍无着，经费不足。我在校董会指示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向当局争到两座日本中学作为校舍，筹款亦略有眉目。到1946年暑期，新聘大中学校长先后到任，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找机会出国进修。

我自定出国的目的，一是继续学习历史，一是考察西方中等教育。1946年9月我在美国东岸耶鲁大学研究院注册入学，本拟一年内读完硕士学位，因一去就通过了英、法语考试，并选读三门课程：西方历史哲学（霍尔朋 Holborn 教授），英国史学史（达纳姆 Dunham 教授、寇底斯 Curtis 教授），当代文化（特纳 Turner 教授），三门都是讨论班，前两门需要阅读大量原著，定期交读书报告，学习十分紧张。一学期下来，我的成绩不错，但是我并不安心，一面惦念在上海的老母妻子，一面对美国生活方式及中等教育水平并不满意。同时欧洲朋友经常来信劝我去英、法，那是西方文明的基地，远比仅有三百年历史的美国丰富多彩；何况我的经济情况只允许我在国外呆一年。第二学期开学前，我去向几位导师告别，霍尔朋教授（原籍德国）表示理解，虽然流露出一忍看我离去的感情。

1947年3月我放弃耶鲁大学的学位资格，横渡大西洋到英国

牛津大学进修。尽管英国正处于战后艰难岁月,必需品都凭票供应,连煤火也不能保证。但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秩序、有纪律、有理想的社会,工党政府正采取多种措施以解决就业、生活、住房、医疗等问题。我在牛津大学旁听了一个学期,上过科尔(G.D.H.Cole)和坡威克(Powick)教授的课,在开架图书室(Camera)里泛读大量新书,在伦敦走访历史学家汤尼(R.H.Tawney)和汉学家威雷(Waley),旁听下议院的辩论。我看到莎士比亚和沃兹渥斯的故乡保存得十分完整;还参观了各类中学——从贵族的“公立”学校到平民的普通中学,阶级界线分明。每次去伦敦必到《大公报》驻英办事处,阅读最新报刊,打听国内消息。国共谈判失败后内战蔓延,加强了我早日回国的意念。

1947年夏,巴黎教科文组织举办国际了解讨论会,中国驻教科文组织代表郭有守邀请我前往参加。讨论会历时七周,我在会上结识了不少外国教育界朋友,为以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创造了条件。在巴黎与老友余敦华重逢,在他陪同指点下,我逐渐熟悉了法国的政局变化。战后法国物资奇缺,人心动荡,各种政治力量与思潮登台表现,尤以法国共产党与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最为活跃,力量日益壮大。我当时对政治兴趣不大,而对法国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学术争鸣的自由风气则大为赞赏。

一年多欧美之行结束了,1947年11月我带回到国内的除了几大箱西方文史书籍外,是人文主义、和平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反法西斯集权主义的思想。这与国内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并且不久就爆发了尖锐的矛盾。

回国后经过一段休整,我自然地回到母校光华大学,担任大学副教授、中学副校长,准备从“而立”之年起大干一番。我在大学

部讲授西洋通史大课（二三百人）和西方史学名著；在附中则从听课入手，检查各课教学质量。光华附中是上海若干最好学校之一，教师水平高，讲课一丝不苟，对学生要求严格，堪称模范教师，不少教师都在大学兼课。大学副校长兼附中校长廖世承是教育界老前辈，20年代后期从南京东南大学来到光华任职，数十年如一日，办学井井有条。1948年底廖先生任大学校长，附中校务由我主持，直至1951年3月我离沪北上为止。

我在大学部除讲课外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一度还代理外语系主任。1948—1949年是多事之秋，国内斗争异常激烈，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但仍图负隅顽抗，迫害民主进步运动。我刚从国外回来，凭一股爱国热情，在讲课时痛斥国民党反民主暴行。我的教学方法也引起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的不满，因为我把二三百学生分为十组，轮流组织讨论，由学生宣读读书报告。这种方法被指控为共产党惯用的宣传方式。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我的手中。原文如下：

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 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教育部 印 中华民国卅七年三月十六日 训字第10394号

我看了大吃一惊，立即找朱校长。他看完密件后安慰我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接着全国发动“反对美帝扶植日本”爱国运动，光华进步学生张贴布告响应，遭到反动学生殴打。我在校务委员会上为进步学生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视为“亲共分子”，次日全校贴满恶毒攻击我的大字报和油漆大标

语。由于学校当局未及时处分这批捣乱分子,到了1948年暑假前他们又发起“改国立”运动,以罢课罢考相威胁,并以我为靶子,要把我驱逐出校,借口是我反对光华改国立,因为我父亲是学校创办人,光华是张家的“私产”等等。这次朱、廖校长亦感到棘手,不得不把肇事为首分子开除、劝退或转学。但这并不能阻止国民党当局在1948年底发动大逮捕和1949年初勒令学校停办。

我怀着对国民党反动腐败统治的痛恨,迎接1949年5月26—27日上海解放。我被教育局正式任命为光华附中校长。1949年冬到1950年初,我参加了上海中学校长学习班。在1950—1951年的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中,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生去参军参干,其中有许多成为杰出的英雄、劳动模范和科学家。

我自己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不得不辞去光华一切职务,于1951年3月重返燕京大学,在历史系任教,讲授世界史。这时燕大已改国立,毛主席曾指示永远保存“燕京大学”这块匾额。从1951年秋季开学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止,我经受了多次思想改造,包括“反对恐美崇美亲美”、“三反”、“忠诚老实”运动等,都顺利通过。院系调整后,燕大合并在北京大学,北大校园迁至燕园,我被留在北大历史系继续任教。在此之前,1951年10月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已被并入新建的华东师大。我的两个母校从此实存名亡。

1952—1956年,学校教学逐渐正规化。在“学习苏联”口号的指引下,教师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放在制定教案、讨论教学大纲、编写讲稿方面,科学研究基本上没有开展。直至中共八大后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研才被提上日程。我这时已完全放弃中国史学的研究而移向世界近代史。为了响应党的号召,

我写了《1904—1910年南非特兰斯瓦尔招用华工事件的真相》一文。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第一，当时我以英国史，特别是英国工运史和殖民史作为主攻方向；第二，亚非拉历史已逐渐引起重视；第三，这个题目过去尚无系统研究，它既需要利用英国史料，也需要利用中国史料，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创见；第四，借此题目来试探解决世界史“为政治服务”的难题。文中突出中国工人对世界的贡献，揭露英帝国主义对华工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篇论文试图为研究中非关系史开辟新的园地。1959年2月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来华度过91岁诞辰，他应邀到北大作题为《中国与非洲》的演讲，我愉快地接受为他翻译的任务。2月23日下午，杜波伊斯在北大礼堂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由我逐字逐句翻译。次日《人民日报》刊载我翻译的讲稿全文，标题为《非洲，站起来！面向升起的太阳！黑色大陆可以从中国得到最多的友谊和同情》。从此非洲对我已不是遥远的大陆。

在向科学进军的高潮中，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学术交流也逐渐展开。1956年8月我同翦伯赞等三位教授经莫斯科到巴黎，参加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这是我1947年以来第二次访法。我又有机会接触各国新兴的一批汉学家特别是法国中年的学者，他们后来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权威。西方汉学家不断用新的方法研究新问题，做出了不少成绩，不应忽视。回国后我鼓励年轻中国史工作者注意国外学术动态，学好外文，以便直接同外国同行进行交流。我的这种观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现在证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在这次出访过程中，我还结识了一些外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苏联的热卢鲍夫斯卡亚，法国的布吕阿，他们都是研究1871年巴黎公社史的专家；还有汉学家法国的谢诺，英国

的秦纳瑞等。我还带回国不少书籍和资料,主要是有关巴黎公社的。从1956年起,我应《历史研究》杂志的要求,每期提供一二篇介绍国外史学动态的文章和书评,总计有一二十篇,起到了开阔眼界的作用。

这股科学研究的热潮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不仅冷却下来,而且改变了方向和方法。第一,历史学从作为一般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转而成为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武器。在当时情况下,我也不得不写一二篇这类应时文章,例如以法国大革命为靶子批判“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第二,从批判一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为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他人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影响越大批判的火力越猛,即所谓“拔白旗”运动;不仅国内的“白旗”(学术大师)要拔,国外的“白旗”也要拔,要把“祖师爷”也推倒。1959年组织的外国文科著作展览,要求各科提出有影响的西方代表作,介绍其主要观点并加以批驳;名为“了解外情”,实际是一棍子打死。我被指定参与历史与汉学两门学科著作的评论工作。要想对这些有影响的著作采取“一分为二”的做法,就被视为“右倾”。第三,从个人科研变为集体科研。在1958年大跃进的气氛下,师生结合编书成为时尚。我与1961级同学共同编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西方工人运动史》,一天内可以写出七八千字,最后留给我整理的“初稿”至今仍在我的书箱中。

1960年,贵阳师范大学历史系约请北大教授去短期讲学——“传经送宝”,我去讲了一周,题目是《西方史学流派》,我介绍了四个学派:德国学派、年鉴学派、文化形态学派、大企业史派。这部讲稿用当时仅有的纸张(草纸)印出,可以作为“大跃进”年代的纪念品。后来我在北大继续开设这门课程,它成为我研究的课